

后更多的是在欧洲层面、国际层面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而非关注自己百姓的生存状况。德国是一个社会福利国家，弱势群体本该得到国家的保护。

四是难民危机也影响到德国的外交政策。从施罗德时期开始，德国转向拓展性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据此，若一个地区发生危机，德国就应该及时介入，其中包括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现任德国内政部长霍斯特·洛伦茨·泽霍费尔（Horst Lorenz Seehofer）努力促进五个相关欧盟国家会谈，探寻难民问题的共同解决方案。原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Ursula Gertrud von der Leyen）2019 年 7 月成功竞选欧盟委员会主席，她也表示上任后会积极促进欧洲难民问题的解决。也许，通过共同协商与探寻难民问题解决模式，有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来促进欧洲一体化的深化、欧盟协作力和凝聚力以及德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随着这次进入德国的部分难民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在经济上逐渐成为德国社会低中层的有效支撑的报道的增多，以及默克尔通过寻求与非洲国家及土耳其等国来联合预防与治理难民问题的举措取得成效，这次难民危机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已得到了控制。关于德国未来的政治版图变化，笔者认为鉴于历史教训，极右翼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在德国是不会持续有市场的，目前德国选择党支持率虽然较高，但这也是因为一部分人表达对默克尔政府不满的结果。长远来看，随着两大人民党内部的调整改革，执政大权依然会由人民党来主导，政府总体上依然会以中间路线为主，也将依然坚持实行以人道主义为主导的难民政策，通过加强内外合作、内部机制和措施的改革，更大力度地推动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难民的快速积极融入，德国甚至可以对全球难民问题的治理提供一个独特的模式。

福利国家的边界与意大利右翼 民粹主义的强势兴起

李凯旋*

2013 年以来，意大利的民粹主义政党一直保持强劲势头，五星运动党在

* 李凯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2018 年议会选举中赢得了最高的支持率，右翼民粹主义联盟党成为右翼政治联盟内的第一大党。在 2019 年 5 月欧洲议会选举后，联盟党已经跃居意大利第一大党，五星运动党则退居第三。联盟党快速兴起的原因是复杂的，非常值得探究。笔者从福利国家的边界视角来进行简要分析。

为什么选择这个视角？笔者在对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组织演变和边缘化的观察和分析中，对意大利福利国家演变产生了研究兴趣。对于福利国家的研究，对追踪和观察意大利的政治格局演变、传统左翼式微、民粹主义兴起等问题而言，意味着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丰富且有力的论据。换言之，意大利目前的情况，无论是左翼式微还是民粹主义的兴起，都与福利制度发展失衡以及相应的改革不足有很大关系。

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意大利福利制度的特点，那么笔者会使用最近两年研究中提炼出的“双重失衡”这个概念。所谓“双重失衡”，是指意大利的福利支出在老年群体和非老年群体，以及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之间存在严重失衡。地区失衡，是分析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内部边界，而外部边界就是所谓的公民身份，合法居留权——这意味着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维护意大利福利国家的内部边界是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在北部壮大的动因，而维护难民危机背景下的外部边界，则成为其在 2018—2019 年国家和超国家层面两大选举中异军突起的动因。

一 联盟党的强势兴起

联盟党实际上是一系列自治运动的结合体，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意大利北方，当时以“北方联盟”为人所知。由于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社会党等传统中右翼、左翼依然占据主导，北方联盟在成立早期影响很小，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才发展起来。联盟党的兴起历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意大利民粹主义风潮的发展历程。

1992 年北方联盟第一次进入议会，参众两院支持率分别是 8.6% 和 8.2%，到 1996 年分别增至 10.8% 和 10.4%。进入 21 世纪后，2001—2013 年，支持率有所下降，降至 3.9%—8.3%。在 2013 年议会选举中，北方联盟依然表现平平。然而随着难民危机的发展，北方联盟强势兴起。2017 年年底，北方联盟更名为联盟党，正式向全国性政党转型。2018 年议会选举中，联盟党在五星运动

党和民主党之后,是第三大党(17.4%),但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34.3%),其在南部也获得15%—25%不等的支持率,这显示其选民已经不再仅仅集中于传统的北部选区。

在近两年的地方选举中(20个大区):联盟党在威尼托、皮埃蒙特、伦巴第、阿布鲁佐等6个大区为第一大党;在托斯卡纳、艾米利亚-罗马涅、巴西利卡塔、撒丁岛等5个大区为第二大党;在利古里亚、翁布里亚、马尔凯等4个大区和南蒂罗尔自治省为第三大党。由此可见,联盟党确实风头强劲,不容小觑。

二 福利国家的边界如何影响联盟党的兴起?

(一) 内部的边界:地区的民族主义

作为民族国家的意大利,虽然实现国家统一已近150年,但南北方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依然不容小觑,经济发展差距仍在扩大。这些都严重侵蚀了意大利构建福利国家所需的社会团结和社会利益认同基础。

意大利的公共养老以正规就业为基础,仿照德国社会保险模式建立。但老年养老救助,即老年最低收入保障和老年收入补贴,均源自税收。医疗卫生,是基于普救主义原则建立起的国民医疗体系,其支出也主要源自于税收。社会服务在意大利基本上一直主要由市级行政单位负责,这意味南北方不同市镇之间人均社会服务支出差距是非常大的,为此中央政府每年都实施一定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在联盟党看来,中央政府为讨好南部选民不断扩大的福利支出,加剧了北部地区的税负,削弱了北方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因此,北方联盟党一直谋求北方地区实现最大程度的自治,尤其是财政权的独立。北方联盟首任党首甚至创造了“帕达尼亚民族”这个名词,以凝聚北方自治主义运动的共识。因此,意大利学者将北方联盟的地区主义视为地区民族主义。

北方自治主义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的出现和兴起,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危机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黄金时代”涌入联邦德国和瑞士等地谋生的意大利南方农民大规模回流(1973年仅联邦德国就有500万意大利移民),这给意大利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压力。政府始料未及,仓促动用了原本用以抵御经济周期波动冲击的停业收入补贴,采用了提前退休的办法应对大规模失业问题。政府还新设立了替代率高达80%的流动津贴,

受益人若未能就业可一直享受到退休。这些支出大部分都涉及一定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1989年，持有谋求自治、反对南方移民主张的伦巴第联盟，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赢得8%的选票，以19%的支持率成为伦巴第大区的第二大党。自此，伦巴第联盟吸收了其他大区的自治主义联盟，成立了北方联盟。

（二）外部边界：国家的民族主义

到20世纪80、90年代，意大利才由移民输出国转变为移民输入国之一。90年代，意大利开始对移民管理进行了尝试性立法，对非法移民进行了界定并出台了相应的惩罚措施。其中，最严厉的管控移民法案，即所谓《博西—菲尼法》，是由北方联盟在2002年联合另一支极右翼政党——民族联盟——推动议会通过的。该法案提出对合法移民实施“配额制”，其目的是防止大规模移民涌入导致本国劳动力市场受到冲击，本国公民失业率上升。同时明确凡参与或帮助非法移民入境者，判处5—15年监禁，罚金15000欧元。2013年后，联盟党成功地向全国性政党进行转型，并利用非法移民议题，在2018年和2019年的选举中博取了意大利南部选民15%—25%不等的支持率。

根据意大利政府的经济与财政文件披露的数据，2012年意大利投入到非法移民管理事务中的经费约为9.9亿欧元。2017年，意大利投入到难民收容、教育、医疗等事务中的总支出达44亿欧元，占2017年意大利GDP总额的0.26%、总社会支出的0.5%左右。其中，7.81亿欧元用于地中海难民的搜救，5.9亿欧元用于未成年难民教育和医疗救助，剩余的约30亿欧元用于收容，而难民身份甄别费用尚未计入。在44亿欧元支出中，欧盟提供了770万欧元的帮助，而这也成为联盟党疑欧、指责欧盟对意大利的非法移民问题熟视无睹的根据之一。

19世纪中期以来，工人和市民权利的扩展本身就是以世界上多数人口不拥有这些权利和利益为前提的。因此，福利是国家主义的，是民族主义的，是有边界的。“在边界之内的‘国家公民’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就业条件、政治权利和社会服务，边界之外的人们就没有这种‘资格’。”而如果允许边界之外的世界也进来分一杯羹，其代价就会变得太高了。

尤其在意大利刚刚开始构筑公民基本收入的安全网，便备受欧盟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摘时，联盟党强硬的反移民、疑欧、反全球化立场不仅在北方颇具市场，在南方也赢得了颇多支持。因此，联盟党短短一年间就在欧洲议会选举中

迅速超越五星运动党和民主党跃居第一大党，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结语

由于个人的研究旨趣和学术关怀，笔者更关心当下意大利左翼的未来。然而，如沃勒斯坦所言，“普选，福利国家和双重民族主义（即国家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成功地将西方社会的‘危险阶级’变成了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经济危机、移民大规模涌入的背景下，左翼的阶级认同正在遭遇民族身份认同的强烈冲击。身份认同，某种意义上与福利边界是一致的。左翼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建构，然而维护福利国家的边界，似乎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天然职责。福利国家，未来依然会是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进行政治动员、争夺选民的核心议题。而其效果，基于过往和当前的经验，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外的经济社会环境。

从人口迁移看美国的政治地理

谢 韬*

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可以说都是一部国内人口迁移的历史。引发国内人口迁移的因素很多，包括经济发展、技术革新、城镇化、天灾人祸、地理气候变化，等等。人口迁移不仅仅是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移动，它也会带来政治空间上的变化，即国内政治力量的重组和消长。这就是政治地理学，它研究的不仅是地理环境（如自然资源和气候）和地理变化（如人口迁移）对政治的影响，还包括政治行为（如恐怖主义）的地理分布。

一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

具体到美国，其人口的地理变化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从 17 世

* 谢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